白先勇訪問記

夏祖麗

五年沒有回來了，這次白先勇趁著他執教的學校放假，從美國回來渡假一個多月。

那天如約到臺北的白府訪問，明知無法再看到他的小說「臺北人」筆下的那種十里洋場，人來人往的盛況，但總好奇的期望也許會有「蘭花已盛開過了，一些枯竭的莖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殘苞在幽幽的發著一絲冷香」（見「臺北人」梁父吟一文）的景象。但期望是落空了。擺在眼前的是一個與臺北的普通家庭沒有兩樣的家，既無想像中的太師椅，中國古董，更無曾經叱咤風雲，

將星雲集的影子。他筆下的「臺北人」在臺北的白府是已經消失了。

只是一、兩個在厨房廳廊走動的老家人，幾個白先勇以四川話，上海話及廣西話接聽的電話，中午飯桌上的那碗辣辣的道地的廣西米粉，及老家人的一聲「少爺」，讓人仍不免回到了「臺北人」裏。

自五年前的短篇小說「國葬」後（卽「臺北人」的最後一篇），白先勇就沒有再發表小說。許多讀者都很懷念他的小說，並期望他的新作品。爲什麼這五年裏他沒有作品出現呢？他說：

「自從『臺北人』出版後，我覺得那一類的短篇小說可以不必再寫了，因爲一個作家自己重複自己的寫作是無意義的。因此我決定暫不寫短篇，而嘗試長篇創作。」

目前白先勇正在寫一個二十萬字的長篇小說，這部書的背景仍是臺灣，描寫的却是臺灣的這一代。與過去的以反諷的方式，描寫捕捉各階級各行業的大陸人在逃亡來臺後二十年間的生活迥然不同。

最近，歐陽子所著的「王謝堂前的燕子」一書，就是把白先勇的「臺北人」裏的十四篇短篇小說加以研析，對其內容技巧及意象做了相當嚴密的批評探討，也有很高的推崇評價。作家劉紹銘曾說過，五四以來的中國作家，論文字組織之嚴謹，意象之豐富，經得起像歐陽子這樣新批評的考驗的，實在屈指可數。

「王謝堂前的燕子」可以說是國內少有的，很完整的對小說的研析與索隱的一本書。從這本書裏，看得出作者歐陽子女士對「臺北人」的每個短篇都下了一番研究功夫的。但是也有人認爲，一個作家創作常是憑着個人的情感與內心的感觸，如果以「學院派」的態度，一字也不放過的去研析作者的創作動機，意象與隱喻，恐怕難免有些附會之處。對於這一點，白先勇的看法是這樣的：

「談起這本書，那要追溯到兩年前的春天了。那時歐陽子因爲嚴重的眼疾開刀。雖然開刀後她的視力減退了許多，但她的心靈却好像忽然開朗了，她的洞悉力忽然敏銳强烈起來。她感到她還有許多事要做，許多書要看，於是她再度拿起『臺北人』。而這次她發覺自己有了新的認識，因此才決定寫成這本書，以捕捉這份驚喜，持之永遠。

「當時我們在美國曾數度通信，但是整個的結構她並沒有與我商量，因此當我看到這本書時，眞是吃了一驚，因爲她對『臺北人』的了解竟比我自己還清楚，她好像把這本書都看透了。有些我自己沒想到的，看了她的評析後，我再仔細回想，我也贊同，也可說是不得不贊同，她的評析我大致是同意的。

「至於說到『附會』這兩個字，我想一個作家寫一篇文章的最早立意，往往與他寫出來後作品的意思不盡相符。比如勞倫斯的名著『兒子與情人』，這本書可以說是自傳體的，當初勞倫斯的原意是要以維護母親的立場寫出他對父親的愛與恨，沒想到寫出來以後，却成了母親對兒子的一種强烈佔有慾，而終於把兒子的生命毀滅了。

「再說『紅樓夢』是十八世紀寫成的，以今天二十世紀人的眼光來看，又有不同的解釋。這些不見得就是『附會』，主要還是要看是否言之有理。一般臺灣的書評，往往只討論作品的主題正不正確，內容如何，却忽略了作品本身的藝術形式。我想一部小說的形式與內容應該是合一的。

「歐陽子受過很嚴格的文學批評訓練，她把小說當做藝術品，她的批評方法值得效法，而且是對讀者有幫助的。」

談起他寫作的開端，及曾受那些作家及作品的影響，他拆開了一包紅色包裝的More牌香煙，點燃一根說：

「我想我的形成期應是受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小時候我特別愛看中國的古典詩詞及舊小說。高中時代，我漸漸喜愛歐美翻譯作品，但眞正接觸到西洋文學是在唸臺大外文系時。中國的『紅樓夢』可說是當今世界上了不得的文學瑰寶，從小到大，我不知看了多少遍『紅樓夢』，它說盡了好小說應有的條件。不過以短篇小說來說，我覺得西方要比中國好得多，結構也較嚴密。

「如果要說那些作家影響我較深，我想是福克納及杜斯妥也夫斯基。當然托爾斯泰更是偉大了，只是前二者對我個人寫作影響較大。他們兩人的作品都有一種悲天憫人的基督精神，這是文學情懷的最高境界。也許也有別的作家作品中也表露出這種精神，却遠不如他們的那樣老邁滄桑。」

對白先勇小說研究透徹的歐陽子曾經說過，白先勇和福克納的作品有很多不同處，比如作品的語氣—白先勇冷靜，福克納激昂。但他們也有兩點極相似之處：那就是他們都偏愛回顧；他們都採用痴狂、墮落、死亡等現象，影射一個上流社會大家庭之崩潰，更進而影射一個文化之逐漸解體。也可說他們道出了一個農業社會被純理性的工商社會取代後，不可逃避的命運悲劇。福克納所影射的，是美國南北戰爭之後衰微下去的「南方文化」。這「南方文化」之精神頗似中國舊社會文化：一種農業社會之下尊重傳統與榮譽、有人情味的，都是滿懷惦緬與鄉愁。但歐陽子認爲，美國南方文化只不過一、二百年歷史，而白先勇所背負的，却是個五千年的重荷！

白先勇很謙虛的表示，他對福克納有一種崇敬的心情，他的作品很能引起他內心的共鳴，只是他却無法與其偉大相比。

也有人認爲白先勇筆下的那種十里洋場人物的取材，與張愛玲的小說很相近。事實上白先勇本人對張愛玲的作品也一直很推崇，這讓人不禁想到他寫作是否受到張愛玲的影響呢？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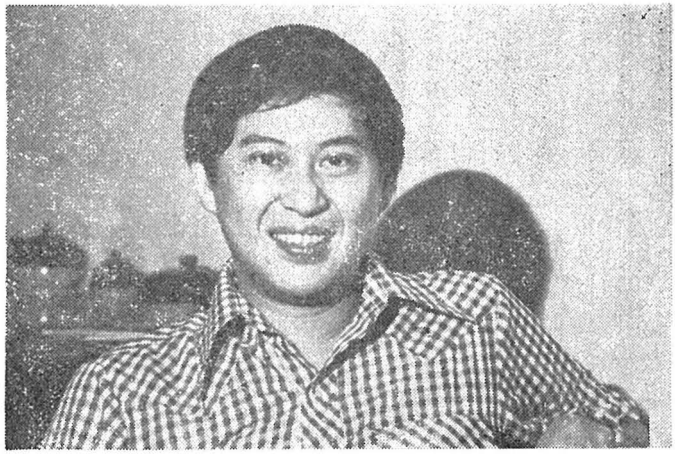
「我受張愛玲的影響很少，因爲我一直到大學畢業後才看她的作品。我想我們如果有相同點那就是，我們都是『紅樓夢』迷，我們都喜歡張恨水的作品。

白先勇和張愛玲在寫作上除了取材較相近外，他們兩人應該都是善於描寫人物，尤其是女人的作家。白先勇雖是男人，但他對一般女人心理具有深切瞭解，他寫女人遠比寫男人，更細膩、更生動。像他筆下的「尹雪艷」、「金大班」、「朱青」、「玉卿嫂」、「錢夫人」……等，都是在他的小說非常突出，且佔著極重要分量的人物。

白先勇個人覺得他筆下的女性他最喜歡的是「金大班最後一夜」裏的金大班。他說：

「有人認爲『金大班』是我筆下最有人味的一個角色，也是最有喜劇色彩的一篇。我的確喜歡她，我寫這篇文章寫的好開心，只花了兩天就寫完了」。說着，他咯咯的笑個不停。彷彿「金大班」那個粗俗有趣、可親又可愛的女人又在他心裏浮現。

「對話」是白先勇寫作上相當成功的一點。他也是一個非常重視「對話」的作家，他說：



王侃攝影

「對話」可以說是小說中的靈魂，對話的功用很多，它是表現人物最好的方法，也能幫助推展故事的發展。對話對於小說整個結構非常重要。也可以說小說成功的第一要件是對話。如果對話失敗，整個小說結構就會鬆散。『紅樓夢』所以成功，就是它的對話技巧太好了，裏面的人物只要一張口，人就活了，那怕是只出現一場。對短篇小說來說，對話尤其重要。」

近年來，海外的左派對白先勇的小說曾加以攻擊。香港的一本左派雜誌就給白先勇封上了一個「殯儀館裏的化粧師」的外號。他們認爲他筆下寫的不是過氣的夫人，就是失意的政客，再不就是充滿「奴隸思想」的僕奴、發瘋的酒娘、一腦子勢利銅臭思想的舞女大班，總之不是共產主義的「人民當家」社會的模範分子。他們攻擊白先勇是個有「階級觀念」的作家。甚至牽強的把專寫小人物的喜怒哀樂的本省作家黃春明的作品做爲對比，以打擊白先勇。

左派這種荒謬的論調，實在只是他們政治宣傳的一種手段。劉紹銘就曾辯駁過，他說，帶着偏見的有

色眼鏡而去看無政治色彩的文學作品，最後看出來的顏色自然是眼鏡的本身色彩了。一個認爲白先勇的主題「不正確」的批評家，自然難會有耐心去進一步研究白先勇小說技巧方面所表現的才華，階級立場本身就是一種自以爲是的政治偏見。

詢及白先勇個人對於左派給他冠上的「殯儀館的化粧師」的封號時，他沒有很激動的加以辯駁，只是很明理的表示了他的意見：

「左派文學是以社會宣傳，政治宣傳爲目的的。合於他們政治目的的作品就是好的，否則就是異端，就是落伍。相信一個文學作品的好壞不在寫什麼？主題是什麼？而在怎麼寫？寫的好不好？如果以作品寫的是某種人物、某種事來評判作品本身是好或不好，那是很可笑的。黃春明的小說寫的好，不在於他寫的是那種人物，而是他對人物的了解透澈，有血有肉的表現。左派認爲只有寫工農兵的才是好作品，這才是基於階級觀念。這是與眞實人生不符的，因爲任何階級都有好有壞，如果非這麼說，那我的作品中也有工農兵，只是寫法不同。對於作家來說，不應該預先有某種階級是好，某種階級是壞的觀念。舉雕塑來說，一個聖母像不一定就比一個妓女像來得好，一件雕塑品的好壞，在於其藝術形式及技巧，而不在於雕塑家雕塑的是什麼。同樣小說也是如此，一個作品的好壞不在寫何種人物，而在寫作技巧的優越表現，我們不能說『紅樓夢』寫的是貴族落沒就不好，而『水滸傳』寫的是綠林好漢就是好的。大陸是沒有文學的，看一部作品等於看一百部一樣，他們的論調與創作的基本觀念是完全違背的。」

至於左派文學認爲白先勇是個不能面對現實的非寫實作家，白先勇認爲其理論更爲荒謬。他捻熄了烟頭，再點起一根烟繼續說：

「任何現代人物都會變成過去，任何現在的現實都會成爲歷史，文學所以偉大存在於其永恒性。古代的詩經到如今看來仍能感人，在於與現代情感仍能溝通。托爾斯泰的最偉大的作品『戰爭與和平』，寫的也並不是當時的事，而是前幾十年的事。而曹雪芹的『紅樓夢』寫的也是作者童年時代的事。小說所表達的是一種不變的人性，七情六慾喜怒哀樂。文學的主題有限，不外中先志病死戰爭愛情，除非有一天發明一種藥，人類完全變了，那所有一切才會成爲眞正的

過去。」

有些作家的作品讓人一看就能感覺到，作者把自己的脾氣及情感及思想非常任性的加諸在他筆下的某個人物或某件事上。但白先勇的小說，即使他小說中的背景與他早期的家庭生活有很大關係，但他與他筆下的人物却是分得開開的。他可以說是一個相當冷靜的作家。

但白先勇本人看來却是一個隨和可親的人，訪問中他總是笑嘻嘻的回答問題，其中却也透露出些許的敏感與善解人意。談到精采處，他不時發出咯咯的笑聲。

歐陽子曾說過，自白先勇的小說中能感到他是一個相當消極的宿命論者，也就是說，他顯然不相信一個人的命運是操在自己的手中。從這個問題我請他談談他個人的個性及人生觀。他笑了說：

「那是歐陽子以『臺北人』來判斷的。我個人覺得我是很積極的。雖然人生有許多痛苦，有許多不可預測而叫人遺憾的事，但偶而一下的喜悅，人性蹦出一點光輝，常使我對人性肯定，使我對人性有信仰，雖然人也有恐怖的一面，但人也有所以爲人的尊嚴。

（王信攝影）

我想我不是悲觀，而是悲感，這也使我對人性更加珍惜。

「我家兄妹很多，家裏又人來人往，我自小在一個熱鬧的大家庭裏生長。據我的母親告訴我，小時候我是個好熱鬧又調皮的孩子，個性是很外向的。在我七、八歲的時候得了肺病，在病床上躺了四、五年，養病使我與外界隔絕。當我病好再去上學時，我的適應力很差，因此也變得敏感而內向。後來一直到大學，我才漸漸又恢復了被埋沒已久的開朗而外向的性格。」

白先勇接受的雖是西洋文學教育，但他却比大多數與他同年齡的中國人更中國化，更喜愛及欣賞古典的中國，這可以從他的小說裏看出來，像這次他回國就忙着看平劇。他認爲這與家庭有關，也和他個人有關。他說，他到美國後，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使他更覺得對自己文化的一種重新的體認，他反而更積極去接觸中國的東西—中國歷史，中國藝術及中國書籍，由此也可見對自己文化的吸收的不足。他說：

「由於年輕人對自己的歷史文化及政治體認不够，出去後受到那麼多面八方來的西方文化的衝擊，使他們一下子被撞得歪歪倒倒，甚至迷失了方向。」

請他談談他對於臺灣這一代年輕人的看法時，他說：

「我們是處於新舊交替一代的，拿我們的眼光來批評這一代的年輕人是不公平的，我們應用新的社會價值來看他們。這一代的年輕人的確與我們當時不同，可以說代溝是存在的。由於社會變動迅速，臺灣新興社會的價值觀念也不同了。年輕的一代對這種觀念接受的很快，他們有活力，有闘勁也有工商業社會的積極冒險的精神。不願再做無謂的打算及犧牲。

「有許多人批評這一代的年輕人變了，變得十分現實。他們只知責備，却忽略了其內在的原因。這與我們國家的教育有很大的關係的。今天，臺灣的教育有很大的危機，即就是極度講求功利，而忽略了人格培養及性情陶冶，以國內被譽爲最高學府的臺灣大學來說，它應是教育文化的指標，但是這些年來臺大却一直沒有藝術系、戲劇系、音樂系及宗教系等文化尖端的人文科系設立，由此可見臺大人文教育之偏廢。臺大尚且如此，可想其他學校了。以美國來說，即使是二、三流的大學，也一寫有這些系，他們對人文教

育很注重，對學生的性情陶冶更看重。比如一個地質系的學生，他可以選中國文化的課程，一個生物系的學生也可以選東方哲學的課。我有一個學生學的是音樂，他又來修我的中文課，畢業後却又從了商，雖然他走入繁碌的商界，但是他工作之餘仍可有語言及音樂方面的興趣調劑，以平衡他的生活及人格。

「我們臺灣今天工商業之發達，可以說是受美國影響很大，我們完全拿美國社會的那一套來比。但是一般人看到的美國只是表面上的講求金錢和效率，却忽略了人家在工商高度發達之下，也有一種平衡內在精神的因素。我們的教育只講求功利，忽略了心靈的培養。我想這是因爲我們一向輕商，現在不能不向工商屈服，於是有這種很尷尬的現象發生。由於一般的年輕人缺乏對自己國家文化的認同，也造成了人格上的偏差。五四時我們有感於科學的落後，所以提出了所謂「賽先生」的口號，來推動科學發展。如今應是回頭推行人文教育的時候了。自五四以來大半個世紀，我們的教育方針一直沒有改動，這實在是很令人費解的事。

「我希望工商界人士能拿出錢來做一個文化基金，支持文化活動，找十個商業鉅子，就算一人一百萬，也有一千萬了。臺灣有人才，但沒有人培養，沒有人愛護。美國所以人才濟濟，出人頭地，是大家不惜老本來培養。商業鉅子們應向洪建全看齊啊！」

目前白先勇在美國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國語言文學。聖芭芭拉是個大學城，山環水繞風景極美，也是一個著名的避寒暑勝地。

美國式的生活非常簡單，他每天就是教書，看書、寫作及整理花草。他也曾種了許多菊花，想學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境界，但是因不暗花性，菊花全都死光了。

他並沒有固定的寫作時間，往往是卽興而寫，他自認自己的寫作習慣很壞，要很晚才開始。他說：

「因爲我不是捷才，所以寫的很慢，寫的也很痛苦，常常一個晚上才寫幾行，如能寫幾頁已經很高興了。像我的『遊園驚夢』寫了一個暑假，改了五次才寫完。」

他認爲一個小說家是要絕對的敏感的。一個作家心路的磨鍊更重於外界的現實。有些人經歷過許多事

，却一樣也寫不出來，有些人却只要幾眼觀察就够了。像『兒子與情人』的作者勞倫斯就是一個極敏感的作家。他在澳洲呆了七天，後來就寫出了一部以澳洲爲背景的長篇小說「袋鼠」，其中對澳洲當地風光有十分眞確的描寫。

在我們談話當中，白先勇曾多次强調小說是一種藝術。他說：「前幾天，我還和王文興談到現在年輕人寫作的問題。我們都認爲還是有許多年輕人有寫作的理想和熱誠的，只是有點走『投』無路，作品無處發表。年輕人是需要有人嘗試，有人鼓勵的。我們以前比較幸運，有夏濟安老師辦的『文學雜誌』，後來我和班上的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等人又合辦『現代文學』雜誌，使我們的作品有發表的機會，更有許多名作家不要稿費支持我們辦的刊物。當時的社會比較樸實，我們只是一股腦的辦雜誌，寫文章，根本沒想到自己的前途，很遺憾的的這幾份純文學性的刊物，包括後來的『純文學月刊』都停刊了。我希望年輕人如家裏有錢肯支持，不妨自己拿錢出來辦一個純文學性的刊物。

「我想對年輕人說的一點就是，小說是一種藝術，文學是要當成一種宗教來信仰的，要有獻身的精神。絕不是在報章雜誌上發表幾篇文章就够了。」

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他們在臺大外文系同班，後來又携手辦雜誌。這些年，雖然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和生活，却一直未斷過寫作，爲當今臺灣文壇頗受注目的作家，這實在是很難能可貴的。

我要求白先勇以一個小說家的立場，對他的三個同學的作品做一個概括的分析。他笑著說：

「我覺得很好玩，我們四個人爲人作風，文字風格及遭遇各各不同，我們在寫作上互相不影響，但不自覺的四個人互相有一種鼓勵。每個人看到另外的人寫出東西都很高興，我們四個人對現代文學的感情是很近的，因此也奇妙的成了好朋友。

「王文興對文學是絕對的抱着一種宗教苦修的熱誠的。他的小說很冷靜，很理性，毫不留情的深入人心。他也有能够敢於與衆不同的勇氣。

「歐陽子對人性的研究相當的細膩，擅長動機分析，她的小說也許不是很多人能了解接受的，因她的文字不是華麗的文字，她的小說也不是聳人聽聞的。

但她是非常理性與冷靜的作家，她的小說結構嚴謹，常帶有一針見血的功效。

「至於陳若曦，她的作品大概可分爲兩期。前期作品比較不穩定，後期的作品是她逃出大陸之後的作品。由於經歷過了卽麼大的災難，她對情感更加洗練，對人性更加深刻，也有一種悲憫的情懷，她的『尹縣長』是很傑出的。」

白先勇這次回國之前，曾邀請陳若曦到他們學校去演講，她對大陸的生活作了一番非常翔實的報導，當場的中美學生聽了都很感動。自從十年前陳若曦離開美國到大陸去後，白先勇與她有十年未見，這次老友又在美國相逢，彼此都很高興。

從民國五十一年大學畢業後，白先勇就去了美國，在美國十四年，後十一年都在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教書。算算，白先勇早已過了結婚的年齡。於是不免好奇的問他是否有抱獨身的打算。他聽了笑了，連連說：「婚姻太麻煩了！婚姻太麻煩了！一個作家結婚恐怕犧牲很大，連帶他的配偶也要作很大的犧牲。我對婚姻看的很淡，我希望別人都很美滿。我不覺得我是個很好的 Family Man 又何必再拖一個人進來呢？」

這位善於描寫人物及細膩情感的作家，對中外的愛情又是抱持着怎樣的看呢？他說：

「有人說現在已經聽不到，看不到偉大的愛情故事了。我想這並不是表示愛情沒有了，而是改變了方式，也許現代人對愛情比較成熟了。我覺得美國人是不太浪漫的民族，在美國沒聽說『殉情』這回事兒的。如果眞有人殉情，非但沒人同情，反而以『非理性』這三個字批評。美國是一個很理性的民族，我想理性的民族是比較容易强盛的。」

談了四個多鐘頭，下午三點半鐘白先勇還有個約會，我們的訪問也就結束了。最後，這位堅認小說是一種藝術的著名小說家表示，一個作家最大的勁敵還是自己，寫作如同上梯子，步伐將越來越艱險。